

# 目录学的功能

MU LU XUE  
DE GONG NENG



Y  
1



37.68

LY

C-1

# 目录学的功能

【英】罗伊·斯托克斯

刘圣梅 沈固朝 肖 力 余 力  
张志伟 范加宁 陆宝树 徐有富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南京

(苏)新登字第011号

THE FUNCTION OF BIBLIOGRAPHY

Second edition

By Roy Stokes

**目录学的功能**

〔英〕罗伊·斯托克斯著

刘圣梅 等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冶山印刷厂印刷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60千

印数1—1500

ISBN 7-305-01552-0/Z·36

定价：3.50元

## 译者说明

《目录学的功能》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目录学的译作。在西方目录学论著奇缺的情况下，它既可以作为学习西方目录学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目录学、版本学、书史、印刷史、图书馆学等学科的教学参考书。

本书作者罗伊·斯托克斯（Roy Stokes）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当了十一年院长，直至1981年退休。移居加拿大之前，他在英国图书馆事业的许多领域工作过，并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从事过目录学的教学工作，目前他仍在写作与讲学。其代表作有《书目控制与服务》、《目录学手册》以及美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百科全书》中的目录学各词条。

作者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那些在学习初期需要指导的学生们服务。这本书论述了西方目录学的各个方面，在论述过程中既涉及到过去的大目录学家的论著，也涉及到一些健在的目录学家的作品。对不同的目录学观点，作者主张兼容并蓄。所以此书作为学习和研究西方目录学的向导是适合的。

南京大学文献情报学系一批多年从事目录学、西文图书编目、西文工具书、科技文献检索等课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教师，有志于研究西方目录学，1987年4月着手翻译此书，历经两个寒暑，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具体分工如下：导言及第一章徐有富译、第二章陆宝树译、第三章余力译、第四章刘圣梅译、第五章肖力译、第六章张志伟译、第七章及附录A沈固朝译、附录B范加宁译。刘圣梅、陆宝树、徐有富、沈固朝分别校订了全书。译书的组织工作由刘圣梅负责，钱亚新教授为顾问。

译者 1989年3月1日

## 导　　言

任何一个从事目录学领域工作的人，都会很快地习惯于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目录学？”有关这个问题的一般答案往往既令人满意，也留下许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通常必然会按照从事者的个人兴趣去解释。在一个日益专门化的时代，目录学也具有由于迅速发展而带来的一切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本世纪在目录学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令人瞩目的进步。这个领域，如果在一个世纪以前只能被一个人了解的话，那么现在却培养了数以百计的专家。所取得的进展已经引起了整个目录学的变革。它的许多专门领域已经达到了精深、成熟的程度，而这在不久以前还是难以想象的。更为重要的或许是这种变化的速度仍未减弱，而每年的进步，又引起了许多重要的争论。这说明已经普遍取得了成绩，而且必将继续取得成绩，但也象月亮那样还有着黑暗的一面。

我们已经亲眼看到，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专家们不能再在同一研究领域里广泛地交换他们的真知灼见。正如一幅画，某些细节是光辉的，但从整体上看，却失去了它的许多效果；而任何研究领域，只要失去与相关研究的联系，企图存在于孤立的境地，便开始失去它的作用和力量。因此必须加强各个领域，建立一种互相依存的共同意识。以下各章是沿着这些思路所做的一个尝试，主要目的是为那些在学习初期需要一些指导的学生们服务。在任何领域着手进行详细研究之前，了解该领域的限界是至关重要的。许多从事目录学研究的工作者必然會发现他们经常工作于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不是出于需要，就是有所选择。除非他们意识到相关研究对自己的研究会起作用，否则他们的工作是决

不会富有成效的。

一个定义，甚至一个精辟的定义，只能是原物的写照，永远无法反映其栩栩如生的本来面目。一个人怎么能对从来没有视觉能力的人描绘一种色彩呢？甚至给某些实在的事物以精确的定义也会出现困难。一个桔子和一座螺旋形楼梯作为此类问题的例子提出已经有多少代了。一只桔子唯一有效的定义是可以吃的东西，一座螺旋形楼梯的唯一有效的定义是可以借以攀登的工具。或者象一本儿童读物用一种值得称道的明晰的话所说的那样：

“洞是挖的。”正因为如此，讨论目录学各个方面的这几章从不同的角度规定了它们的议题。总的来说，通过这些组成部分所讨论的活动范围、问题、用途及惯例，我试图指出目录学的功能。那些名副其实的有能力的目录学家的工作要比任何定义更加清楚地说明了他们了解所从事的研究是什么。其他人对该工作的一些反应表明没有一个绝对完整的真理，也许如果这种真理存在的话，我们尚未探测到真正的根源。站在一位目录学家身边，注视他如何探讨问题，就会领悟研究方法论。这一切不是都能用语言来说明的。在无法描述时，依靠多年经验所形成的直觉，就能说：“这似乎是不正确的。”或“我认为这一文献有点儿古怪。”由于诸如此类的预感，许多详细的书目研究往往脱颖而出。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没有什么能够取代经验，然而千里之行，必须始于足下。

有的读者发现机器在书目工作中的应用这里提到的不多，感到奇怪和失望。这是可能的，或许最近还是这样。其省略是故意的，也是重要的。几乎一切书目工作领域都受到了不同种类的现代技术的影响。摄影术的运用是重要的第一步，缩微摄影就其作用而言，甚至更为重要。接着发生的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产生了变化，直到计算机的出现，从而产生了一场革命。没有人想要或者试图低估引入现代技术的巨大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已经融

入我们的研究方法之中。机器并没有改变目录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如果我们是幸运的话——机器将会拯救充满能源危机的未来——我们将更多地依赖没有思维能力的机器更加迅速而彻底地完成任务，甚至会具有更大的精确性。同过去一样，目录学的功能在未来肯定会变化和发展，但是不会因为新技术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每年将抓住那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机会，但是我们仍不放弃那历史悠久的目标。

由于目录学整体的每一部分都具有一定的形式和内容，因此，不仅每一部分的作用，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都比较容易了解。那么，如果在目录学研究中存在着相互渗透，现在正是回顾的最好时机，因为这一点在最近几年并不明显。波拉德（A. W. Pollard）说得好，所有的研究都是在那把兼收并蓄的“大伞”下进行的。

# 目 次

## 导言

1 目录学的定义.....	1
2 列举性书目.....	20
3 分析目录学或评论目录学.....	52
4 描述性书目.....	84
5 资料的编排方法.....	109
6 版本目录学.....	127
7 历史目录学.....	164
附录A .....	193
附录B .....	198

# 1 目录学的定义

从事目录学研究最初遇到的最大困难莫过于精确地理解“目录学”(Bibliography)这个词的含义。其根本性的混乱起因于下述事实：即这个词的一个极为普遍的含义已趋向于覆盖其它一切含义。在多数情况下，这个词被用来表达“书单”这样一个简单的意思。即使在这个最有限的含义方面，它也总是被误用来包括任何这样的书单，而不问它们是有选择性的，还是综合性的。至于带有目录学意义来使用这个词的却很少。

如果对这个词的理解大致如此的话，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就是“目录学”这个词的所有含义了，而“目录学家”(Bibliographer)无非是书单的编纂者。目录学家所能期待接受的只是善意的嘲讽，也就是约翰逊(Johnson)给词典编纂家这个词所下的定义：“一种无害的枯燥无味的苦工。”在多年的习惯用法之后，现在对这种总的印象的任何改正似乎都是困难的，特别是因为这个含义与其说是错误的，不如说是不完全的。

人们经常指出这个词本身运气不佳，因为从语源学的角度看，它的本义就是书籍的抄写。这是《牛津英语词典》关于这个词的第一个义项，但是该词典也指出这个义项已废弃不用了。上述义项的来源是1678年，由爱德华·菲利普斯(Edward Phillips)，在他的词典第四版所下的定义中提供的。大约在17世纪晚期，这种用法似乎开始流行。菲利普斯著作的较早版本可以追溯到1658年出版的第一版，然而没有这个词条。在下述标题下，

出现了“Bibliography(希腊语)，书籍的抄写”这条定义。该标题是“受拉丁语或希腊语影响的词汇集，这些词汇或是谨慎使用的，或是偶尔一现的；从总体上看，是作为不规范的、非法合成的、派生的而被废弃的词，那些最不好的词则要记上一个剑号(+)”。<sup>①</sup>稍可欣慰的是“bibliography”逃避了一个剑号的羞辱。菲利普斯在“scribe”这个词条中所下的定义是“抄写员、秘书、代笔者”，从而赋予了这类旧词以新的生命力。

而“bibliographer”作为不同于“bibliography”的词，是出现得较早的一个，它是1656年被托马斯·布朗特(Thomas Blount)记录下来的。<sup>②</sup>他的词条是“Bibliographer(bibliographia)，书籍抄写者，抄写员”。随之出现的词条还有“Bibliotheque(bibliotheaca)，图书馆，或书房。”及“Bibliolist(bibliopola)，书商”。这个词作为抄写员这一特定含义的用法，持续的时间是有限的。波拉德追溯这种用法最后一次出现在1761年。<sup>③</sup>那年出版的芬宁(Fenning)的词典把“bibliographer”描述为“一位写书或抄书的人。”<sup>④</sup>恰好在这种用法最后一次被列入词典之前，约翰逊博士仍忠实地于他所处的时代，在忽视“bibliography”的情况下，却给“bibliographer”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一位书籍抄写员：一位誊写者。”<sup>⑤</sup>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这种用法是

① Edward Phillips, *The New World of English Words*, 4th edition 1678. (Wing P. 2072)

② Thomas Blount, *Glossographia or a Dictionary Interpreting the Hard Words*, 1656 (Wing B. 3334).

③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ition, 1911, Vol. 3, p. 908.

④ Daniel Fenning, *The Royal English Dictionary; or A Treasu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T/P reads 1741, privilege and dedication are dated 1761.]

⑤ Samuel Joh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 vols., 1755.

相当流行的，除这段时间以外，它总是很少被碰见。鉴于在很久以前被确认的词都早已通用，所以很难想象在布朗特或菲利普斯所处的时代，该词会被广泛使用。在整个手写本时代，在书籍被大量写作或抄传期间，在没有作者观念的情况下，诸如抄写者、抄写员这些词，似乎已经够用了。要想精确地弄明白为什么“bibliography”和“bibliographer”两个词的这种特殊用法竟会出现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是困难的。它的这种用法终止的原因倒是更容易理解些。波拉德认为含义由“书籍的抄写”转变为“对书籍的描述”出现于18世纪的法国。这与该类写本的增加是完全一致的，写本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新的藏书热潮的刺激，在法国尤甚。1763年出现的德毕尔（De Bure）的《指导书目》作为这种新型著作的见证和这个词的词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见证而流传至今。<sup>①</sup>

数十年后，当贝纽特（Peignot）把“bibliographer”解释成一位对书、书史以及所有与印刷术有关的知识有过专门研究的人时，这种用法多少获得了一些较为正式的支持。<sup>②</sup> 19世纪初，这种新的含义在英国的托马斯·弗罗格纳尔·迪布丁（Thomas Froggnall Dibdin）的作品中已被接受，在其他作家的著作中也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可。这个词也有过一些竞争者。尽管偶见使用“书的学问”（book-lore）一词试图在同一研究方向中另有侧重，而罗伯特·索锡（Robert Southey）却宁愿使用“版本学”（bibliology）一词，但很少受到普遍支持。即使对索锡用法的支持从精确的统计方面来说是有限的，然而还是可以说已经获得了一些权威性的支持。当波拉德为《英国百科全书》第11版

<sup>①</sup> Guillaume-François De Bure, *Bibliographie instructive, ou traité de la connaissance des livres rares et singuliers*, 7 vols. Paris, 1763-8.

<sup>②</sup> Etienne Gabriel Peignot,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bibliographie*, 3 vols. Paris, 1802-4. vol. 1. p. 50.

撰写有关该学科的条目时，其标题为“目录学”与“版本学”（Bibliography and bibliology）。沃尔特·格雷格爵士（Sir Walter Greg）鉴于“版本学”比公认的“书的学问”一词能更精确地限定这门学科，曾分别于1912年和1932年两次在目录学会致词中对“版本学”一词被弄得无可挽回而深表遗憾。<sup>①</sup>这样一些支持者的学术地位是不应忽视的。现在可以十分肯定，尽管“目录学”一词不正确、效果又不好，然而既然保持下来，那就只好听其自然了。

然而，人们仍普遍希望保留“目录学”这个词，以专指对书籍进行学术性或“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许多有关书的著作，那些写书的内容的人除外，采用这个词基本上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出于理性。这里并非贬低这些著作，它们中许多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这些研究与现在被称作目录学的是两回事，类推之，最好称之为“书的学问”，但是，现今比较普遍地称作藏书学（bibliophily），主要与搜集图书有关，大部分著作都出于这种特定的角度。这类著作赞美收藏书籍的快乐，赞美书籍物质形态的美感，以及与其他书籍爱好者相聚时志同道合的感情等，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值得称赞的，而这样的作品并非属于目录学。在新目录学时代以前，很少有作者感到这种辨别的必要。因此埃默森（Emerson）在著作中说到罗克斯伯勒（Roxburgh）式装订的图书销售热时，实质上指的是对书籍的爱好。

当对书的正常爱好变为对稀有版本或手稿本的追求时，书

① Greg's 1912 Address, 'What is bibliography?' was printed in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XII (1914), pp. 39-53. The 1932 Presidential Address 'Bibliography—an apologia' was printed in *The Library*, 4th Series; (being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2nd Series; XIII (1932-3), pp. 113-43. Both are reprinted in W. W. Greg's *Collected Papers* edited by J. C. Maxwe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籍嗜好者们能变得如痴如狂。目录学年鉴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大约在本世纪初，这种疯狂达到了它的顶点。<sup>①</sup>

另一方面，艾萨克·迪斯雷利(Issac Disraeli)感到有必要创造“bibliognost”一词来表明那种与“在书名页、版权页……及一本书所有细节中获得知识的”有点儿相似的热情。<sup>②</sup>

要追溯用于描述以上活动的这些词汇的历史有不少困难，而困难正说明了目录学研究中词义的变化。事实上，目前的状况同它到19世纪末出现时相比，几乎恰好相反。在那之前，一组不太相关的研究通过一些意义模糊词义变化不定的词而为大家所了解，现在一个词，或者至多两个词——如果“藏书学”也被当作流行词语的话——正被普遍使用。虽然对这个词本身已经不再有争议，但它的含义却并不相同。迪布丁时代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以上，一个定义接着一个定义出现，渐渐地某种典范的定义出现了。一个特定时期的目录学研究的侧重点必然反映在这个时期的定义中。无论它过去有过多少种不同的解释，目前的出发点必然是当代定义中最令人满意的。

1945年，目录学学会出版了题为《目录学学会(1892—1942)——回顾性的研究》的纪念性著作。<sup>③</sup>这个题目的基调是由沃尔特·格雷格爵士在他的题为《目录学——一点回顾》那一章提出来的，<sup>④</sup>在这一章，沃尔特·格雷格爵士写道：

为了避免歧义，我宁愿将“目录学”定义为对作为物质载体

---

① *Essay on 'Books' in Society and Solitude*, 1870.

② Isaac Disraeli, *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 1839 ed. Vol. III. p.

43.

③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1892—1942, Studies in Retrospect*, London,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1945.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Studies in Retrospect*.)

④ W. W. Greg, 'Bibliography—a retrospect', *Studies in Retrospect*, pp. 23—31.

的书的研究。这个界说是重要的。是直接针对异说的一种限定；这种异说已广为流传，现在也仍在流行，但是在我看来它们仍然很糟糕。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也许在研究《创世纪》，或者《奥德赛》，或者《基督教规》，或者《物种起源》，或者《捣蛋鬼们的书：动物世界》（*The Bad Child's Book of Beasts*），但是从不涉足长长的书目，因为书目与书的学科内容是毫不相关的。<sup>①</sup>对于目录学功能的讨论，没有比格雷格的出发点更好的了。他把重点放在作为物质载体的书的研究方面。同时，也再没有比上述摘录的引文中最后一句更为重要，它否定了目录学同书的文字或学科内容的联系。这一限定条件，我们要牢记心上。

实质上这个问题已变得十分简单。书籍这个词，根据格雷格的说法，应被理解为一切传递思想的耐久的物质载体。1945年，他甚至打算在将来就“一盘留声机的录音是否是一种书”这一问题展开公开讨论。<sup>②</sup>

在历史上有一段时期，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表达的思想随着他们声音的消失而瞬息即逝，在另外一些时期，通过日益精密的发明作为媒介，使语言本身得以永存，还有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提供了目录学至今仍需对之关心的大量资料——人们利用了与时代及文明标准相适合的一切物质手段。岩画、烧制的泥版、纸莎草纸卷、小牛皮、羊皮纸和纸写本、活字印刷，所有这些都证实了，在过去各个历史时期，人们曾借助它们同那些在时间上、空间上隔绝的伙伴们进行通信联系。随着时间的流逝，现代富有创造力的头脑大大扩充了这些媒介，书目的状况也变得日益复杂起来。然而，不管将来储存人类思想的工具变得多么复杂，没有什么会改变或者能够改变目录学的作用。它的任务同过去一样，将永

① *Studies in Retrospect*. P. 24.

② *Studies in Retrospect*. P. 25a.

远是“对文献借以传播的物质手段的研究”。如果对托马斯·阿奎那斯(Thomas Aquinas)和莎士比亚手写本的研究已经成为对它们的版本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研究埃利奥特(T. S. Eliot)使用过的打字机问题也是重要的了。<sup>①</sup>

目录学关心的是物质问题和此类物质的特点，但如果撇开纯粹的搜集古籍的乐趣，仅仅为了它们本身缘故去阐明这些问题，那么将会一无所得。主要兴趣总是在与被传播的文献之间的关系。目录学家对手抄本的兴趣基本上在于手抄本所包含的原文，而对于作为物质载体的印本书的关心是为了其中所包含的原文能够被更好地理解。目录学的功能因而转变为对这些形式的传播手段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每一种书，不论它包含什么内容，开始总是作为一种构思出现于一位作者的心中。直到那时，尚未涉及书目，但是作者一旦在纸上写下草稿时，那么初稿也就创造出来了，这时它就具有了书目意义。虽然人们很自然地认为这是“一份”手稿，但通常是指一整套稿本。这同样适用于莎士比亚戏剧的那些“一塌糊涂的手稿”，或马尔科姆·劳里(Malcolm Lowry)小说的初稿。著作内容的逐步完善可被追溯至任何出版物问世以前。在许多情况下，一份稿本、一份在剧院供排练的台词本，或由劳里递给出版商的改写本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最早的印本很可能出自手稿。那么目录学将变得逐个关心这些抄本的物质形态问题、所有初印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初印本与它们得以产生的原稿之间的关系。随着岁月的流逝，较晚的印本有时要根据较早的印本，有时要根据原稿，有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编者对作者所撰写的内容的说明。目录学的职责范围是试图理解和解释存在于多次印本、数千种抄本；少量稿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最重要的是把这一切

<sup>①</sup> S.K.Aithal, ‘The typewriter in the making of *The Waste Land*’,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33. (1980). pp. 191–3.

同表现作者原来写作意图的原文联系起来。

目录学的领域初看起来是如此广阔，如此难以对它下定义，以致要使它具有任何整体意义，必须研究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些部分被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因而难于把它们看成带有谱系图匀称结构的进化关系。与其这样，倒不如说它们是围绕一个中心的几个方面，每一方面都受到其一切近邻的支持，当然由于各自工作的侧重点不同，相互支持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多年来，目录学的各领域或所划分各部分的术语已经发生改变，作为这种改变的结果而产生的混乱同伴随目录学总名称本身的混乱一样多。所不同的是：与给整体命名相比，对各个组成部分的命名更少一致。从给目录学各部分下定义以获取广泛、普遍的一致这一点来说，弗雷德森·鲍尔斯（Fredson Bowers）在目录学界并非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从另一方面说，还没有人为这种尝试提供过如此有益的开端，劳伦斯·罗斯（Lawrence Wroth）把这一尝试称为“通向远方”。

在最近几版的《英国百科全书》中，鲍尔斯写道：

在现代，目录学一词通常与两种活动联系在一起：(1)列举性（或系统性）书目：按照一些分类法或分类表把那些具有一定关系的书排列起来的目录；(2)分析性（或评论性）书目，把书作为有形的对象来考察，旨在重新获知它们的生产过程的细节，并且分析这种生产过程对任何版本的图书的物质特征的影响。

分析目录学能够被用来单独追求任何特定的目标：可以作为一门纯粹的学科来研究，揭示和解释有关保存于各个时期的书的外形特征形成的过程。然而，这些知识的运用通常采用两种形式：(a)描述性书目；或(b)版本书目。①

① Article under ‘Bibliography’ in printings from 1959 until the 1st edition.

自从此文发表以来，在鲍尔斯的许多文章中，他在上面的这段引文里的观点，始终没有根本的改变。围绕鲍尔斯著作的任何争论，不仅是因为他对该学科领域的划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对该学科的一些分支的重视程度。

就书目一般作用而言，精确的列举性从未被入怀疑过，然而列举的范围和方法论正处于变革的阵痛中。长期以来，列举性书目所追求的目标似乎已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而事实上，现在这种不可能的事也许仅用不长的时间就能实现了。至少只要重新考虑列举在书目中的作用，那么，使它变得有价值是完全可行的。它的首要任务是在一个特定的类目中创造出一份所有存在的，或已知存在过的资料的记录。这种类目是可以被限定，并相当容易理解的。它也许是大的、复杂的，甚至可以扩展成为所有文献资料的记录，从而实现这一从未实现的古老梦想。必须了解存在着的相关资料，这对于任何学科的研究是极端重要的。这一点就传统而言，一直是列举性书目或系统性书目的作用。可能引起争论的是：由于它与书的物质属性没有什么关系，它究竟是不是一种书目研究工作？其实，把它视作这一学科领域的专家应具备的部分知识和能力更符合逻辑。

另一方面，分析目录学正处于初步被世人思考的过程中，因而还没有形成社会概念。这里，格雷格对书籍物质特征的研究十分详细。这是一项仍处于最初阶段的研究，其复杂性每过十年就会增加。由于这一领域中的新式武器的潜力尚不清楚，因此，我们不可能划定分析目录学的范围。最广泛、最笼统地说，它的内容包括揭示和解释从手稿到成品的“转变手段”的每一件事实，佛格森（Ferguson）称之为“书的传记”。由于传记采用的是为人们通常所接受的编年的排列方法，所以用于分析性书目也是很适用的。

正如在许多其它学科中一样，在目录学中，其重大的基础研